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新民：

铭记抗战历史贡献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喆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8月21日，在“湖南与伟大抗战精神”学术研讨会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新民作主旨发言时说。

“在抗日战争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湖南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龙新民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是反抗日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刘少奇、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抗战工作，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后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政委重建新四军，在中原五省抗日战场上声威大震。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长期在华北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百团大战名震中外；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血洒太行，是抗日战

争中为国捐躯的中共最高将领；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罗荣桓，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一师师长粟裕、三师师长黄克诚、六师师长谭震林，以及董必武、陈赓、许光达、谭政、杨得志、王震、耿飚、傅秋涛、钟期光、王首道等著名湘籍将领，率部浴血抗战，建立不朽功勋。在正面战场上，程潜、唐生智、刘斐、宋希濂、郑洞国等一批湘籍将领也作出重要贡献。

龙新民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记载着发生在湖南的若干重大事件。如：1939年，国共两党为培养游击战术人才，在南岳合作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三期训练班培养出3000多名游击战骨干；长沙会战、衡会战等重要战役，有力抗击了日军的攻势；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入湘开辟鄂赣抗日根据地；“芷江受降”宣告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和中国人民14年浴血抗战的终结……所有这些抗战史、党史重要事件，都彰显了湖南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and 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回顾抗战的艰难历程、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铭记湖南在文化抗战中的特殊贡献。”龙新民介绍，七七事变后，面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严酷现实，1937年10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吕振羽、翦伯赞等湘籍文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带领湖南文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运动。茅盾、田汉、艾青等文化名人先后到湖南，支持和推动湖南的文化抗战。

在抗战文学方面，丁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达苏区的知名作家，她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先后写了《彭德怀速写》《新的信念》等多篇抗战题材的作品。张天翼创作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辛辣地揭露了那些“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客的丑恶嘴脸。周立波写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等报告文学，详细记载了边区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抗战文学为中华民族14年抗战史留下了史诗般的画卷。

“在抗战音乐方面，湖南更因汇聚贺绿汀、田汉、吕骥等音乐巨擘，成为全国抗战

音乐的创作与传播高地。”龙新民介绍，1935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该影片的主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抗战时期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符号，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确定为国歌。吕骥作曲的《新编“九一八”小调》《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都成为抗战时期歌曲经典之作。众多抗战歌曲、音乐作品传遍三湘四水和全国各地，犹如战斗的号角，唤起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成为抗战宣传的重要载体。在抗战戏曲、抗战美术等方面，湖南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举办‘湖南与伟大抗战精神’学术研讨会，对深入研究湖南的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迪。”龙新民认为，要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大力宣传中国人民14年抗战苦难而辉煌的历程，大力宣传在抗战中涌现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努力在新时代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辉煌业绩。”

“湘籍共产党人和湖南人民长缨在手，以铁血筑长城，用精神壮湖湘，凭着不屈不挠的抗争，谱写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抗日史诗，汇聚起连绵不绝、浩荡前行的精神洪流，为形成和升华伟大抗战精神扛起了不可或缺的湖南担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湖南贡献。”8月21日，在“湖南与伟大抗战精神”学术研讨会上，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谢承新论述了湖南在抗日战争中的担当与贡献。

湘籍共产党人为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作出突出贡献

谢承新认为，抗战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决态度和鲜明立场，与国民党长期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形成鲜明对照，深刻证明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是中国共产党”。“湘籍共产党人积极倡导并坚决维护我们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的鲜明政治立场，有力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提出并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奠定了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谢承新介绍，毛泽东既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的奠基人，也是贯彻执行统战政策的带头人和开拓者，领导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刘少奇赴华北，林伯渠驻西安，徐特立驻长沙……湘籍共产党人积极倡导、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推动我党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抗日战争的整体走向，以自身政治主张的战略前瞻性、科学预见性，有力引领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走向。”谢承新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共产党人系统解决战争的对象、方针、道路、前途等关键的基本问题，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決定性力量。”谢承新举例说，毛泽东指挥全党全军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巩固敌后根据地，刘少奇屡次临危受命领导三大战略区发展，林伯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打造“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湘籍共产党人积极投身领导开辟、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以模范行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

湖南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彪炳史册的牺牲和奉献

全面抗战初期，湘鄂赣、湘赣、湘粤赣和湘南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徐特立带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省工委团结和影响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掀起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先后到湖南指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极大地增强了全省人民在严酷敌情威逼面前的抗战信心和勇气。“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党组织领导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引领湖南抗日救亡高潮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谢承新说。

“全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有6次发生在湖南。”谢承新谈到，三次长沙会战粉碎日本“以战迫降”战略目标，常德会战对巩固中、美、英的联合作战和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重要作用，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湘西战役提高了中国军队“反攻之士气”……湖南发生的6次会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谢承新现场分享了几组数据：从1937年11月24日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湖南，到1945年8月21日“一纸降书落芷江”，湖南约70%的土地和3/4的人口曾沦为敌手。湖南人民在自身承受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每年供应军粮超1000万

担，军布300余万匹、军棉7万担，并提供大量的钨、铅、锡、锑等战略物资，以巨大的物产资源支撑着中国战局。“湖南人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付出巨大代价，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中国抗战全局胜利的‘南天一柱’。”

浩歌声里请长缨 最是精神壮湖湘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笑雪

担、军布300余万匹、军棉7万担，并提供大量的钨、铅、锡、锑等战略物资，以巨大的物产资源支撑着中国战局。“湖南人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付出巨大代价，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中国抗战全局胜利的‘南天一柱’。”

长郡校内，学生高唱“我有铁，我有血，我有热血，可救中国”；民训队中，湘女低吟“已是家亡国破时，要抽利刃斩情丝”；南岳之巅，宗教人士“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谢承新说，强烈的爱国情怀是激发湖湘儿女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历史伟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帜。

“坚决抗争还是屈服投降，是摆在每一个湖湘儿女面前壁垒分明的选择题。”谢承新说，在武汉，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会场，毛泽东“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的铿锵言论久久回荡。在长沙，“我们要把舞台当作炮台，要把剧场当作战场”的歌曲脍炙人口，湖湘儿女“宁为沙场鬼，不做亡国奴”的气节与世长存。

左权“太行浩气传千古”，邓永耀“领兵下高山”，孙开楚“以笔墨为利刃”，黄君珏让“战地黄花”永不凋谢……谢承新认为，湖湘儿女在抗战中展现的雄浑英雄气概，正是伟大抗战精神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展现，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升华。

毛泽东以《论持久战》统揽全局，鼓舞人心；文夕大火后，湖湘儿女“犹有不磨雄杰气，再从焦土建湖南”的斗志依旧昂扬……在谢承新看来，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是激励湖湘儿女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实现理想追求的强大动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信念支撑，是炎黄子孙五千年文明维系凝聚的精神纽带。



8月21日，“湖南与伟大抗战精神”学术研讨会在芷江侗族自治县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湖南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等主题进行交流。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晓 摄

“父亲以殉道者的精神，为国家民族服务”

——访袁国平烈士之子、原海军指挥学教授袁振威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笑雪

“父亲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呕心沥血，奉献了一切。”8月20日，来湘参加“湖南与伟大抗战精神”学术研讨会的袁国平烈士之子、原海军指挥学教授袁振威接受了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这位86岁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深情追忆了父亲的烽火岁月。

袁国平是湖南邵阳走出来的抗日英烈，曾先后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毛泽东称他“政治开展，经验亦多”“是我军著名的宣传鼓动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延安治病的袁国平，在给他侄子袁振鹏的信中说：“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去抗日前线工作。”

1938年3月18日，中央任命袁国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他主持制定《新四军政

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使新四军政治工作条例化、制度化、正规化；协助叶挺和项英完成对新四军部队整编，参与制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创办《抗敌报》、《抗敌》杂志、《抗敌画报》等，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抗战期间，袁国平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大江南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秋，日军为摧毁新四军指挥中心，确保长江航运畅通，掠夺秋粮，配合其对重庆等地的进攻行动，对皖南地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新四军采取阵地防御、游击战、运动战、长途追击等多种战术，歼敌三千，将敌彻底击溃。

这次战役是叶挺将军亲自指挥的。袁国平则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在繁昌、铜陵方向阻击敌人，在前线直接指挥部队与敌人拼杀。袁振威后来了解到，当时险

情频出，有一次炸弹就落在指挥所旁边，两名战士一个被炸断了腿，一个腹部受伤露出了肠子，都牺牲了。“父亲带一个卫士排，几十个人最后只剩下‘10条枪’。”

“1941年1月，父亲在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皖南事变’中，身中4弹，重伤难行。”袁振威神情凝重地说，战士们舍不得放弃我父亲，就用树枝简单地搭了一个担架抬着他走。到了青弋江边的章家渡，大家不顾寒冬冰水刺骨，水浅时用手抬，水深时用肩扛，水深齐胸时用头顶，一路与敌人战斗，艰难地到达岸对面。

“父亲吃力地睁开眼，对副连长李甫说，你们不要管我了，赶快突围。当时大家都在流泪，谁也没有注意到父亲已经摸出了他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袁振威悲痛地追忆。

“这一枪，他把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5岁，实践了‘如果我们有一百发子弹，要

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袁振威想起，父亲曾在1939年给侄子袁振鹏的家书中说：“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是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

“参军是父亲对我的愿望。”袁振威说，自己的小名是父亲起的，叫“浣郎”，是家乡话“皖南”的谐音，意思是要他记住皖南，记住皖南人民，记住为民族生存、人民解放而英勇战斗的新四军。“所以我下定决心要穿上军装，继承他的事业，为军队建设努力工作，并作出了应有贡献。”

“离开皖南时，我刚8个月大，父亲牺牲时我不到两岁。”袁振威告诉记者，父亲对他的教诲，更多地是通过母亲的言传身教感受到的。母亲留给他最珍贵的遗产是两句话：“忘记社会上的一切优越条件，靠自己去生活”“不要把你爸爸的功劳记在自己账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史专家陈宇：

湖南战场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铸造地之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笑雪

“湖南作为抗战的中坚战场，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巨大的军事贡献、无私的战争保障以及蕴藏其中的全民抗战精神，深刻阐释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更在血与火的实践中赋予其丰厚的实践内涵。”8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史专家陈宇在“湖南与伟大抗战精神”学术研讨会上分享自己的观点。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发生于全国正面战场的22次重大战役中，有6次集中于湖南。”陈宇介绍，这6次大规模绞杀战以“四围一平一负”的战绩，在中国抗战的整体防御态势中独树一帜。湖南以其复杂地形构成天然屏障的同时，通过一系列防御反攻的拉锯战成功迟滞、消耗日军达7年之久，彻底打破了侵略者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妄想。“湖南承载并捍卫了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必胜信念，成为‘百折不挠，

必胜信念’的信念高地。”

“三湘子弟以血肉之躯支撑着抗日战场前线。”陈宇说，湖南累计输送入伍的壮丁高达210万人，位居全国第二。全省3000万总人口中，每15人即有1人应征入伍，人口参军密度为全国之冠。他们在长沙、常德、衡阳等惨烈战场上浴血拼杀，以决死勇气践行着“宁死不为亡国奴”的民族大义。超过10万名湘籍将士血洒疆场，用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篇章。

作为稳固的抗战后方枢纽，湖南构筑了极为高效的物资供应与全民动员体系。陈宇介绍，每年稳定供应前线军粮超1000万担、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省内军工厂月产手榴弹60万枚、迫击炮弹14万枚、掷榴弹7.2万个等；被服厂提供的御寒冬装仅棉服一项便超300万件，保障了前线将士的基本生存需求。

“战时湖南民间支援行动声势浩大，深刻彰显了民众与前线将士‘同舟共济、共赴国难’的生死情谊，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陈宇举例说，在历次大会战中直接支援前线的湖南民众累计达100多万人；1940—1942年全省自发捐飞机款超700万元，居全国首位；湖南特产的桐油出口获得外汇约2000万美元。

陈宇认为，湖南军民在抗战中呈现出的英雄气概，深植于湖湘文化所积淀的“打落水狗和血吞”的“霸蛮”独特精神气质。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敢于牺牲的血性风骨、坚韧不拔的意志底色、知行合一的务实理念，深深渗透于抗战军民血液中，成为支撑湖南7年浴血奋战的核心精神源泉。

“湖湘文化在战火中熔铸成更高层次的民族品格。”陈宇说，7年坚守未被完全占领，6次大会战取得优异战绩，体现了湖南军民面对强敌压境时坚不可摧的韧性

与决绝，展现出“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意志力巅峰。不仅成为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内涵组成部分，也以其独特内容丰富了抗战整体精神的实践表达形式。

陈宇认为，象征最终胜利的洽降地点选定在芷江并非偶然。湖南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军民协同、共赴国难；自立自强、攻坚克难；自信勇武、英勇顽强”等伟大抗战实践，为伟大抗战精神核心内涵提供了极其深刻的注脚和理论贡献。

“湖南战场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最为闪耀的试金石与重要铸造地之一。”陈宇说，深入发掘湖南对抗战精神的多维度贡献，有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全民族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内在逻辑。湖南军民身上闪耀的忠诚担当、敢为人先、敢于斗争、坚韧不拔的精神光辉，将不断照亮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奋进之路。